

老池和我

秦伯益



“老池！”“喂，老秦！”。老池和我就这样相互称呼了50年。50年内中国社会变化了很多，人际关系变化了很多，我们自己也变化了很多，职务、职称等更是变了又变，但老池和我之间的相互称呼却一直没变。称呼没变，关系没变，感情没变。

在1955年留苏预备生的选拔考场上，我第一次见到老池，他长我8岁。我是刚毕业的学生，他是已有科研和社会工作经验的干部。虽然那时他也只是30刚过，但在我眼中却已然是一位成熟的中年男子。尔后，我们一同在北京俄语学院学俄语，1956年秋坐着同一节车厢到苏联，进了同一所学校，同一个教研室，在同一位导师指导下做论文，在同一个实验室里做实验，在同一个办公室里看书，住的是同一个宿舍，第一年还在同一个寝室，合用同一张书桌，早晨一同上班，中午一同吃饭，晚上一同回来，一同参加课程学习，一同通过学位考试，一同参加学术活动。那几年，与老池接触最多的人就是我，与我接触最多的人就是老池。

老池那时还兼着中共列宁格勒市中国留学生党总支书记，有大量社会工作要做。开始几个月，我每天下午四、五点钟回宿舍就一头扎进生理和药理参考书里，一坐几个小时积极备考，他却回来后还要到其他学校的党支部去安排工作，一般要七、八点钟才能回来。开始我担心他这样会影响学习，但他从无怨言，不声不响，不慌不忙。他看书很专心，很快，很得要领，结果考试成绩斐然。从这里我感到老池学业上功底很深，基础扎实，持重老成，“讷于言而敏于行”，有大聪明，而且总是与人为善，乐于助人，是一位可以倚重的长者。

不久，导师要为我们确定题目。那时苏联刚合成二巯基丙基磺酸钠，想叫老池做此药对锑中毒的治疗作用。老池看过结构后说，我国已合成了二巯基丁二酸钠，疗效很好。导师一看化学结构，大喜。他说他原想叫苏联化学家合成的就是此结构。苏联化学家说此药合成太难，合成了苏联现在的药物，不想中国化学家已经合成了，请立即寄一些来，作一比较。比较后，果然中国的好。在

此同时，张昌绍先生访问我们实验室，张先生的学识、风度、学术讨论中表现出的敏捷思维和如流对答，给我导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说，中国有这样好的化学家和药理学家，培养出来的学生肯定差不了，从此改变了以为中国人还是拖辫子、缠小脚、抽大烟的落后印象，对我们也刮目相看了。这是我出国后第一次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：要外国人尊重我们，只有我们自己争气，有实力才能有尊重，光说“向您学习”、“友谊第一”是不够的。

进入课题研究后，我没有科研经验，不知从何下手。老池总是非常耐心地教我如何一步步地开展工作。如何查文献、做卡片、写综述、建方法、写记录、做统计、制图表、写论文、几乎每一步研究工作的基本步骤都是老池指点我做的。对我来说，导师是把握研究方向的，辅助导师是关心研究结果和进度的，老池是帮我如何一步步获得研究结果的。老池是我进入科研领域的引路人、启蒙者，是我的良师益友。特别是到论文工作快结束时，考虑回国后做什么，那时老池对国内药理学界的情况比较了解，帮我分析了国内对药理工作的需要和很多单位的研究方向，曾建议我回国后做新药评价工作以发掘我国的新药资源。为此，我结束论文工作后在苏联参观了十多所科研和教学机构，参观的重点主要围绕新药评价的理论与实践。回国后我被分配到军事医学科学院，在长期军事毒物药物研究中，自然而然地做了不少新药评价工作，其中就得益于那段时间对新药评价工作的关注与打下的基础，可见老池对我业务工作影响之深远。

回国后40多年，南北两地，鱼信雁书，时有联系。尤其近10多年来又都从事阿片类药理毒理研究，协作更多。青年时的友情，老而弥笃。其实，从性格和作风来说，老池和我是很不相同的。他稳，我急；他冷静，我热情；他不张扬，我少含蓄；他一生平安，我跌宕起伏。尽管老池和我有很多表现上的差异，但有不少本质上的相同，这就是实事求是地对科学，全力以赴地对工作，真心实意地对朋友。“人生得一知己，足矣”。回忆50年的友谊，我感到欣慰；瞻望这友谊的前景，我倍加珍惜。